

“延迟退休·利民·利国”研讨会

时间：2015年4月25日下午

地点：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05 室

承办单位：清华大学公管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清华-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演讲嘉宾： 都 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汪泽英 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 研究员

路锦菲 华东师范大学 副教授

杨燕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胡乃军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博士

于 淼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生

秦 勤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硕士生

点评嘉宾：

姜春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研究员

唐 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研究员

罗桂莲 中国保监会基金监督管理司 博士

主持人： 杨燕绥 清华大学公管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杨燕绥：今天是个好日子，是清华校庆之日，有一些研究成果会在校庆的时候，作为一个活动和礼品献给社会，献给各位校友，所以今天很热闹。借此，我们也把一些研究成果和大家作个交流。今天来参会的朋友都是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研究，包括媒体朋友，也都是这几年以来一直关注延迟问题的。

这是一个即敏感又深刻的话题，延迟退休，先讲利民，然后再说利国。大家的研究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延迟退休是客观的，但是要想做这件事，就得先利民，然后再说利国。如果你说国家老龄化了，养老金支付有问题了，这个事情是做不成的。首先说，人的寿命延长了，每个人需要多工作，需要个人多积累，为自己的老年能够有更丰厚一点的养老资产。在 50 年代初的三个诺贝尔奖，一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他讲一个人怎么计算自己一生的职业生涯期间的人力资本，又怎么分摊到退休之后。接着是弗里德曼讲平滑消费的，你工作 40 年的收入一定要留一部分，保证老年的财务独立。然后是莫迪利安尼讲个人财务周期，第一阶段入不敷出，挣的不多，我看在座的很多都是年轻人，要养孩子、要买房子，这时候要欠债，欠国家的、欠银行的

或者欠父母的。什么叫幸福？就是让年轻人尽快实现财富自由，把房子买了，把孩子养了，有结余了，财务上有变化了，为什么呢？以前是靠劳动一小时，挣一小时，吃一小时，当你有了富余就投资，你有两份收入，幸福应该从这个时候开始。前几年央视一直问大家什么叫做幸福，幸福从这里开始，欠着账是不会有幸福的。老龄社会文化即终生自立，不是养儿防老，也不是孩子们养你，因为孩子的精力是有限的。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期三个诺贝尔奖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因为那个时候西方国家都进入老龄社会了。

虽然，我们缺乏人口的国民教育，今天汇报的研究成果，是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和清华-布鲁金斯研究中心合作，从方方面面做的研究。同时，人社部社保所的汪泽英研究员，社科院的都阳研究员，他们的研究很早也很系统，有深度。还有北大的赵耀辉老师，今天下午有课所以没来，都有所研究。布鲁金斯中心的主任齐晔老师是搞环保的，赶不过来，今天我是连致辞带主持，用 50 年代初三个诺贝尔奖的核心思想告诉我们一句话——老龄社会人要学会终生自立，这就是老龄社会的核心文化，用这样一个概念作了前面的主持词。在清华校庆这样一个日子里，大家对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问题，用三个小时进行比较充分的讨论是有意义的。

首先，请人社部社保所研究院汪泽英讲他这些年的研究，而且他已经成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写成一本书的还不多，先请汪泽英老师讲讲，接下来请都阳研究员介绍，其余的就是我们清华团队从不同方面对它的研究，后面有三位重要级的评论员，首先是中国对外经济交流中心的姜春立部长，他是国务院的大笔杆子，而且学习能力非常强，在近两年参与国务院层面这个问题的研究。另外一个更重量级点评嘉宾是我的伙伴唐钧老师，过去媒体说我们两人是对立的，其实我们俩一直都不对立，只不过我们说问题的角度有点不同，今天我们还是要从不同的角度说这个问题。第三位请中国保监会资金运用监管部投资监管处的博士罗桂连评论。评论完以后大家都可以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做到先利民后利国，让老百姓满意了国家才好做，这就是我们的研究目的。

汪泽英（略）。讨论退休政策问题要坚持几个原则：一是逐步提高原则；二是与人口、经济、就业等相协调原则；三是性别上的差别、同步及增幅不同原则；四是补偿性原则；五是弹性原则；六是提前告知原则。退休和在职是生活状况的改变，在国内外有很多案例，由于生活状态没有调整好，退休以后导致身体健康下降，导致家庭矛盾，所以要提前告知，让他有一个准备，国外还专门对退休进行引导，怎么适应退休生活。七是配套原则。

杨燕绥：汪泽英是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的副所长，他有一本书专门阐述这个问题，大家

可以看看。

下面有请都阳研究员报告。

都阳：谢谢杨老师邀请，我跟杨老师上次在北大也说过这个题目，大致的意思差不多，我们自己也想就这个问题进一步做一些工作，还没有更深入研究，我先把思路向大家汇报一下。

其实延长退休年龄是社会各界非常关注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它涉及到太多的利益相关方，有政府、有雇主、有雇员，雇员包括马上要退休的人和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这些人，所以它是政策性非常强的议题。涉及到的方面内容也很多，比如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养老体系是否平衡，是否会提高青年人的失业率，对劳动力市场的潜在增长是否有影响，还有是马上要退休的人是否愿意退休，接受提前退休的事实，还有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

我们观察到一些事实，首先，实际退休的年龄跟法定退休年龄是有差距的，2005年不到52岁，2010年不到53岁。如果按照法定退休年龄来比较每个个体，计算整个提前退休者的比例，大概有将近89%的女性、58%的男性并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退休并不意味着他就不劳动了，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是有这个趋势，我们查了一些资料，在OECD国家，65岁以上仍然保持就业的比例，在2013年已经达到18%，美国是22%。根据中国六普的资料，65岁以上老人的就业率是21%，主要集中在农业，农业当中6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者超过8000万人，65岁以上的超过4000万人。根据我的年轻同事程杰做的研究，有1000万人边工作边享受养老金的群体，大概65岁以下有900万人，不到60岁600万人，这就意味着我们退休制度的设计本身是有很大的改革空间的。

我今天讲的主要内容，如果从退休制度设计的话，仅仅从某一个方面来考虑，可能不能解决刚才所提到的诸多问题，因此我们要有一个更好的框架去讨论怎么设计我们的制度，更直白地说，应该把退休制度的设计纳入到整体劳动力市场的制度设计中来，这样才不会孤立地考虑某一个群体或某一个事件的影响。

从养老体系的可持续性入手，首先，假设在我们现行的制度环境下采取的是事实上的现收现付养老体系，在未来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的可能，因为不管怎么样的养老制度设计，总是要靠当期的产出来养当期的老年人。第二，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简化，假设整个劳动力市场只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第二部分是行将退休的人，我们认为这两者和退休制度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退休的人退休了，对于社会来说，可能会损失他带来的一部分产出，对企业来说损失了劳动力，同时社会要支付养老金。但是同时有新加入的人，带来新的产出和新的养老资源。因此我们说，我们的体系设计，从社会的角度看，一个现收现付的体系要求新加入的人带来的收益要大于对于退休的人的支出，我们用A和B来

表示。

假设年轻一代的劳动生产率是 P_A ，既有给社会贡献的部分，也有自己拿的部分——工资 (W_A)，因此他的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的关系是 $W_A/P_A = \alpha_A$ 。退休的人也产出 P_B ，退休前工资是 W_B ，还有养老金的替代率是 r 。B 退出劳动力市场，实际上会影响到 A 能不能加入劳动力市场，老人退了会影响到年轻人能不能加入，因为这涉及到岗位的供给和其他因素，有 B 退但并不依然有 A 加入，这个概率是在 0-1 之间的数。考虑这么多复杂条件的话，养老体系可持续的基本条件就是新加入的人的边际产出与退休者的边际产出的差额，新来的人比退的人的生产率更高，这个高的差额是能维持养老金支付的，这样我们这个社会的养老体系是可以持续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但是如果要实现这个基本条件，我们下面会看到，不仅仅是靠退休制度设计那么简单，所以才说应该把退休制度的设计纳入整个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中来。

用公式来表达， $\beta (P_A - \alpha_A P_A) + (P_B - \alpha_B P_B) = r * \alpha_B P_B$ ，我们把这个式子作个转换（见 PPT），均衡的条件就是两代人之间生产率的差异应该满足于这个条件，整个社会的养老资源就可以保证养老金的持续。

所以，可持续性实际上取决于一系列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退休年龄的设计，但是它不足够保证我们这个体系的持续。

首先，我们希望代际的生产率差异越大越好，也就是我们希望 P_A/P_B 越大越好，如果新加入的年轻人比将要退休的人的产出越高当然是越好。第二，我们希望 β 越大越好，因为 β 是 0-1 的概率，也就是老人退了并不必然导致一个年轻人进入，这就是我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观察到的情况，我们希望这个 β 越大越好，那么 β 怎么越大越好？这实际上涉及到劳动力制度的设计。第三是 α 上升，也就是每个人的工资与他的生产率的比，在劳动经济学上有一个名词即单位劳动力成本，它也会影响到养老体系。当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越快，就越不利于我们这个体系的持续。

我们看一些事实，比如两代人的生产率差异（见 PPT），我们用六普数据做的分年龄的受教育年限，越年老的人受教育程度越低，越年轻的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如果是一个完美的竞争市场，我们的教育是有回报的，那就意味着更年轻的人的劳动生产率越高， P_A/P_B 高，这是很值得我们欣慰的地方，也就是中国应对老龄化问题很重要的一个破解的领域。当然这是一个隐含的条件，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的生产率就越高，是不是这样呢？取决于很多的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与教育制度的设计、教育的回报是有关系的，如果说教育像前十年的回报率那么高的话，我们可以说年轻人的劳动生产率也很高，以后是很有希望的。但是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高中以上教育相对于初中教育的回报变化实际上是在逐渐下降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潜

在高生产率的群体存在，但是我们怎么充分利用他们？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跟退休制度的时间没有关系，但是它的确影响到了养老体系的可持续性。所以，教育回报和人力资本体系的设计和运转是影响到养老体系的持续性的。

第二，在很多有养老危机的国家往往伴随着青年人的高失业率，中国也有可能存在这个情况，看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根据 05 年的小普查数据和 2010 年的六普数据做的分年龄、分性别的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劳动参与率在中间这块是高的，然后很陡峭地上去、很陡峭地下来。

根据用六普数据观察的分年龄的失业率，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高，但的确是越年轻的人失业率越高，如果失业了， β 肯定是很小的。当然，它可能和退休制度的设计有关系，但是也和其他就业制度的设计更加直接相关。所以，我们怎么提高 β 是劳动力市场需要更加关注的问题，和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也有关系。

如果一个社会，特别是在快速老龄化的社会，需要有越来越多的资源去养老的时候，不希望单位劳动力成本 (α) 增长得快，但是这几年我们工资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 α 增长的速度，养老资源从哪儿来？正在劳动力市场中工作的这些人，他们工作了以后，除了付出给他们的工资以外，剩下的资源是可以用来养老的。所以， α 如果快速增长的话，肯定是不利于养老资源的可获得的。但是 α 为什么增长得这么快？这和劳动力市场本身的供求感到是有关系的，同时也和劳动力市场的制度设计采取什么样的工资机制是有关系的，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以上我们已经有一些基本的事实，表明在中国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讨论退休年龄的问题，但是我们仅仅从延长退休年龄本身去关注养老体系的持续不足以解决我们当中的很多问题，可能还不一定就是问题的核心，因为我们知道，还没达到一个高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仅仅去靠合养老制度的改变而不靠社会生产率的提升，是很难去解决这个实际问题的。

同时，我们从微观数据的反映来看，实际退休年龄小于制度现行退休年龄，反映了一部分群体为什么不愿意延长退休年龄，为什么如此？当然需要更多的研究。今天研讨会的题目叫“延长退休·利民·利国”，如果完全是帕累托改进的话，不会有那么多反对的声音，肯定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我们想，要达到帕累托改进，仅仅靠退休制度的设计是不够的，需要从其他制度的设计上来帮助我们把这个制度完善。

当然，我们现在的退休制度肯定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特别是能否有一个弹性的退休制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应该鼓励具有更高生产率的人能够就业，这样我们获得的 P_A 越来越多，我们鼓励至少允许低生产率的人退休，这样持续性会增加。

其他和退休制度关联的劳动生产制度包括更加灵活的就业制度，从事实上来观察，我们的

就业保护越来越强，这对于劳动力来说是好的一方面，同时它也导致了就业机制的越来越僵化。昨天楼部长在清华也讲到这一点，实际上，更灵活的就业制度是可以提高 β 的，这对中国来说很重要的一方面。

更有弹性的工资决定机制，更加市场化的工资决定机制是能够提高教育回报的，提高教育回报就会鼓励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投资，这样就有利于提升 PA 和 PB 的比值。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把退休制度的改革纳入到劳动力市场整体改革的设计中来，来通盘考虑，这样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

杨燕绥：都阳研究员的研究非常理性也非常理论，是把退休年龄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关联在一起。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大家可能知道撒切尔小政府改革，把英国的很多政府都缩小了，后来发现政府不是小，关键要好，又把很多部门恢复了。原来英国把卫生部和社保部合并了，后来又分开了，卫生部还叫卫生部，但社保部叫做“劳动与养老金部”，就是刚才都阳研究员指出的问题，届时英国已进入深度老龄社会，面对两代人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养老金费率和养老金替代率的关系，劳动与养老金部要搞好就业市场和养老金市场的治理，英国从此没有社会保障部了，社会保障部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

下面请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路锦非副教授发言。

路锦非：大家也知道，前一段时间关于延退的问题的讨论，全社会是沸沸腾腾，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当然反对的声音是非常多的，作为我们学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应该是非常客观的讨论。汪老师从延退政策非常全面的角度、都阳老师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就业整个机制来的角度做了非常好的研究。我想集中一点，即我国退休政策改革的人口学证据，从人口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来解答一下面对社会上的置疑和负面情绪，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对我国退休政策的回顾。现代意义上正规的退休制度是建立在社会化集中生产和社会风险集中管理时期，因为我们采取的是集中方式、有分工的生产方式，必然会有集中的劳动力管理及相应的社会风险管理。因此我们的退休政策已经不再仅仅由劳动者个人做出，而是一个结合考虑全社会集中风险管理的各种因素来考虑的，比如一个国家公共政策服务的理念和价值观，比如我们国家、美国和欧洲，在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提供程度上是有不同理念的，这是一个大的公共政策领域的影响。再一个是劳动年限，还有工作的行业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等等各种因素的共同决定。所以各国的退休政策一定要符合其本国的国情，并且随着国情的改变也应当有所调整 and 变化。

就我们国家来看，1951年，政务院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当时在这个条例上第一次提出退休政策的蓝本，男职工60岁，女职工50周岁。大家一定要理解当时的背景，政务院这个条例是针对刚建国时在公有制的单位中非常有限的人群中，因为刚刚建国的时候，城镇人口只有7000多万，其中城市人口只有5000多万，是非常小的一个群体，是针对他们给出的退休政策。1953年对相关的实施细则给了修正草案，但是草案增加了其他方面的信息，退休年龄没有改动。1955年又出台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增加了一条，女干部的退休年龄为55周岁。1978年国务院出台了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规定，仍然沿用原来的退休政策安排。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国家实行的是男女有别的、退休年龄比较早的退休政策，男60岁，女50，女干部55岁，特殊工种可以提前退休。从1951年建立这个制度，一直到现在，到2015年，我们这个政策仍然在执行，堪称最为稳定的政策，没有“之一”，我们国家变化这么大，退休政策一直没有变。

问题来了，这个政策这么稳定，我们其他的背景因素有没有变化吗？变化太大了，人口老龄化已经是现实存在的。第二，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吗？支付压力逐渐增加，养老金替代率日益下降，养老金的购买力日益缩水，而个人账户空帐又在不断扩大，这也是摆在眼前的问题，也是为什么政府现在着力要推延退方案。为了应对我们养老保险的相关压力，提高缴费比例也尝试了，扩大覆盖面也在做，降低替代缴费率也做了，剩下一个我们如此慷慨的几十年前制定的退休政策还可以维持吗？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一下，我国人口转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死亡率下降为主导的转变，第二个阶段就是出生率下降为主导，我们国家实行了生育限制政策，计划生育，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从1980年之后，整体人口比较稳定，粗死亡率一直维持在6.5%左右，粗出生稳步下降，2007年是12%。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带来的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一方面是老人不断增加，1982年65岁以上老年人是4.9%，但五普的时候，这个比例是7.1%，实际上1999年我们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了。与此同时与它对应的是，老龄人口增加的时候，0到14岁的儿童数量急剧下降，在1982年占33.6%，1990年27.7%，五普的时候只有22%，六普数据只有16.6%。一方面老人增加，一方面少年儿童降低，所以老龄化的程度是比较严重的，在持续上升。

我们关注的是退休政策出台到现在我们的人口到底是怎样变的。一开始汪泽英老师提的特别好，已经把问题提出来了。大家都知道退休政策出来之后我们的人口预期寿命大幅度提升，这实际上是指0岁预期寿命大幅度提升，建国前0岁预期寿命只有35至40岁，1950年我们调查是52.5岁，1957年是57岁，2010年接近75岁。但是大家知道，这个人口预期寿命的提升是由于婴儿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而导致的，建国前婴幼儿的死亡率是200%，50年代末的时候是

47%，六普时的数据维持在 13%左右，婴幼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导致我们的 0 岁预期寿命提升。

第二个因素，我们不能光看这个，那是由于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导致的，这也是一些学者提出我们延迟退休这个政策还需要非常谨慎的重要原因，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年龄别预期余寿显著提高，60 岁的人口预期寿命从 90 年、2000 年、2011 年是在稳步上升，上升幅度很大，2011 年六普时我们测算出的 60 岁人口预期余寿是 22.8 年，也就是 60 岁退休还能活 22 岁。

第三个变化是人口结构迅速老化。从 0 岁人口预期寿命和 60 岁预期余寿以及人口年龄结构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事实解决，我们国家的人口国情从制度出台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的相应政策是不是也应该有调整？如果我们调整了会怎么样？不调整会怎么样？因为目前来讲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主要还是在城镇就业人口中实施的，所以我们看城镇人口的状况，这部分采用的是联合国方法，因为它是从城市化率这个角度进行预测，涉及到若干参数的假定，我们搞人口的都知道，测算和估计模型是比较庞大的。

采用这样的方法，采用相应的模型，因为联合国的重点是城市化率，所以我们需要分年龄别的城市化水平以及分年龄别的全国平均城市化水平的偏离率相关的数据经过模型的整合，得出在未来中国城镇人口的整体数据变化。我模拟出从 2012 年-2050 年我国各年龄组人口的数据，根据这个数据判断一下如果我们的退休政策不作改变会怎么样，那就是基于人口支撑的城镇负担太大了。我们通常讲 65 岁以上人口算是老年抚养比，算社会的老龄负担。但根据我们国家的退休年龄政策，事实上按照 65+来统计的老年抚养比不足以反映我们国家真实的养老负担。

到底是 60 岁还是 65 岁进入被扶养状态是非常关键的，将严重影响到城镇人口的抚养压力。2013 年，65 岁的老年抚养比是 16.99%，65 岁是 10.2%。到 2030 年，这个差距将扩大为 12%，到 2050 年将扩大为 20%。也就是说，这个差距是在急剧拉大，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做了简单的测算，2030 年，60 岁退休的人是 1970 年出生的，在我们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之前的一大拨人口生育高峰出生的一批人将集中在 2030 年前后进入退休年龄，从 60 岁到 65 岁期间前后十年左右的时间是我国的人口出生高峰期，这些人退休和不退休将极大地影响养老金的压力。所以，到底是 60 岁退休还是 65 岁退休，这个问题从人口的角度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如果采用 65 岁退休，2050 年时我们的养老压力大约是 1/3，还是可以承受的，但如果还是沿用 60 岁退休这个政策，将有 52.36%的人就是老年人了，再去掉下面的小朋友，有几个人可以供养我们的社会？这是一个摆在眼前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从人口客观的发展来讲，现有的政策真的不可持续。

除此之外，我们国家的问题更加复杂，都阳老师已经分析了，从劳动力市场观察到的真实情况看，60 岁退休的人都是少数，大部分人更早就退休了，所以提前退休的问题在我们国家非常严重，这个问题已经极大地侵蚀了养老金。所以我的想法很简单，第一，在延迟退休之前一

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杜绝提前退休，仅仅延迟退休的作用不是那么大，需要延迟，但是更重要的是先堵住提前退休这个口子。第二，延迟退休，考虑到社会的反映，延迟不仅要渐进，从我的分析来看要尽快，我看到网上的各种方案都太慢了，要快一点，要在我国退休高峰期的问题爆发之前把我们的问题解决。

杨燕绥：路锦非的研究认为人口应该进入新常态。下面请于淼博士发言。

于淼：大家好，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延迟退休对青年就业的影响。

针对这一问题，当前学者主要有四个观点：一是延迟退休会挤出青年就业，增加青年失业率。它有两个假设，一是一个社会的工作岗位数量固定，二是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是可替代的。基于这个假设，得出的结论是延迟退休会增加老年人在社会中的就业比例，进而对青年人的就业产生影响。当然这一研究结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经验数据的支持。

第二个理论就是延迟退休对青年就业是没有显著影响，认为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就业岗位并不是一一对应的，青年人的就业岗位主要以低级岗位为主，而老年人由于能力、经验、工龄等方面的优势，以高级岗位为主，因此对青年人就业的挤出影响不大。

第三种观点认为延迟退休不但不会挤占青年就业，反而对青年人就业有促进作用。这个社会并不是封闭静止的经济体，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就业规模来吸引更多的人来就业，延迟退休能提高劳动力供给，就是老年人劳动力，一方面他们有工作经验，他们的生产率可能是比较高的。对于发达国家可能有两种，他们在 70 年代已经大学普及了，受教育年限是一致的，70 年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和 90 年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差别不大，比如美国。第二，都阳老师可能忽略了工作经验的积累，除了受教育年限对于劳动生产率会有回报，不同工龄的劳动生产率是不一样的。劳动人数的增加可以降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能维持劳动生产在最优生产规模，从长远来看能提高经济增长率，进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第四，延迟退休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对不同性质的岗位、不同性别的人的影响程度不同。比如对于体能要求较高的岗位，老年人由于体能由于可能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对于青年人的挤出效应不高，对于技术要求比较低的岗位，老年人因为具有经验丰富的优势，因而即便达到退休年龄时，可能获得一份工作的概率也比较大，因此他们对青年人的替代作用可能较大。相反，对于技术要求比较高，产业更新换代快的产业，老年人的就业可能比较小，对青年人的挤出效应比较小。与女性相比，男性老年人对青年的就业挤出可能更明显。

我们用 20 个 OECD 国家 1996-2010 年间的面板数据，应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因变量是青

年人就业率，自变量是 60 岁到 65 岁老年人就业率，当然我们控制了 GDP 增长率、人均 GDP 倍数等因素的影响。初步的结果，不同年龄段青年人的就业率，自变量是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就业率，我们发现老年人的就业率对青年人的就业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所以延迟退休反而是一个促进效应，也就支持了观点二。

我们分别对男性和女性的情况进行了讨论，实践证明我们的结论是稳健的。

下面汇报正在进行的研究，主题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这是用北京大学家庭健康与养老调查 2013 版的数据。不同教育水平的受雇女性的退休意愿，期待 50 岁以后退休人口占比，我们发现女性不论何种受教育程度，她们都非常希望工作到 50 岁以后，这就表明我们目前对女性退休年龄设计得过低，不能满足大部分女性的意愿。对于男性不同受教育阶段退休意愿的讨论，样本是 597 人，所有都是受雇男性。我们发现，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初中、高中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期待 60 岁以前退休，占比 31%，这部分人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从事的大部分是重体力劳动，在 60 岁时，他们的体力不能维持现有的工作量，所以有较强的退休意愿很有意思的是对小学和初中学历的人，他们有相当一大部分的比例有推迟退休意愿，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工作的时候收入比较低，他们的预防性储蓄比较低，迫于生计需求，不得不工作到退休年龄以后来养家糊口。对于受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大专和本科以上这部分人，他们的延迟退休意愿是比较强的，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的知识积累比较高，他们的职业技能贬值速度比较慢，所以他们的延迟退休意愿高于低学历的人。

杨燕绥：下面请秦勤发言，她的硕士论文与大家讨论一个热点问题——养老费率。按照老龄化时间表，赡养负担越重，养老费率越高。OECD 国家的老龄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维持养老费率在工资的 12%~19%，不再改变，以此协调两代人的关系，其中有几个变量，一个变量涉及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秦勤：各位老师、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公管院的硕士研究生，杨燕绥老师是我的指导老师。我汇报的是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保险缴费率平衡机制的研究，是我的初步研究成果，希望能和大家分享讨论一下。

我们把各个国家的老龄化程度以及他们的缴费率进行了对比，在 50 年代，很多国家已经进入了老龄化，70 年代、90 年代，很多国家已经逐步进入深度老龄化，德国是在 2012 年前后进入了超级老龄化，而我国在 2004 年前后才进入老龄化。对比与缴费率来看，很多老龄化程度已经很严重的国家，他们的缴费率还相对保持在较低水平的恒定状态，而我国在老龄化程度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条件下，缴费率水平不断趋高。这就是我要研究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在老

龄化程度不断趋重的情况下还能保持缴费率相对平衡的状态。

文献研究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定性分析，缴费率较高或较低对于国民生活和基金运行的利弊分析；二是定量分析，一般都是针对某一个行业，根据精算原则测算基金的平衡或测算出它的最优点。在老龄化不断加重的社会背景下，很多人提出了延迟退休的政策建议，但很少有文献将缴费率和老龄化进程进行比较去研究它的平衡机制，我这里将 OECD19 个国家基于 6 个指标进行了聚类分析。（1）65 岁以上占人口的比重；（2）法定领取养老金的年龄；（3）55-64 岁年龄人员的就业率；（4）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5）养老金替代率；（6）净移民率；共计 133 个观测值。对 19 个国家进行的 K 值聚合分析结果是，19 个国家分成两个组别，第一个组别包括奥地利、匈牙利在内的七个国家，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大龄人员就业率也比较低，养老金替代率比较高。第二个组别是包括比利时、加拿大、德国、日本在内 12 个国家，他们的相似程度在 6 个指标中表现为老龄化程度较高，养老金替代率偏低，大龄人员就业率偏高。

再把缴费率放进来观察，根据 EOCED 的平均值来看，第一组别呈现的是低老龄高费率的情况，第二个组别呈现的是高年龄、低缴费率的情况。对第二个组别进行进一步的系统聚类分析可以发现，德国、日本、加拿大、美国这四个国家具有最相似的特点。

对德国案例分析，发现以上五个变量在起作用。首先，是延迟退休政策，从 2012 年起将退休年龄从 65 岁提高到 67 岁，从 2004 年起就有一些政策阻止国民提前退休，比如根据不同的提前时间会有一定的养老金领取比例的折扣。对于自愿延长退休年龄的这部分人群，会给予 0.5% 的计提，鼓励他们延迟退休。对于严重残疾的人员，也会相应提高他们的退休年龄。对于大龄就业人员，德国政府 2006 年提出了“50”计划，包括很多复合工资项目，比如政府会对大龄人员就业提供一些工资补助，同时对于接收大龄人员就业的企业进行一些经济的补贴，去提高他们的大龄就业率。据欧盟研究报告，德国预计在 2060 年大龄就业参与率将达到 75%。对于第三产业，德国政府在近十年将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偏移，服务业已经占 GDP 的 70%，而且这些服务业每年都会为德国提供 77% 的就业岗位。德国大量引入移民政策，包括绿卡计划、蓝卡计划，纷纷降低了移民政策的门槛，根据 2012 年统计，德国有 239 万的净移民人口去缓解德国老龄化严重的情况。德国的报告显示，他们在 2030 年将引进 13 万净移民去缓解养老金运行体系。另外一方面，德国的养老金替代率也在逐步下降，已经从国际劳工组织的 55% 在 2009 年降到 40% 左右的水平，预计到 2060 年将逐步降低到 35% 左右。

美国在延迟退休方面做了更详细的阻止提前退休和鼓励延迟退休的详细政策，他们的弹性退休政策针对三类人群，愿意提前退休的、法定时间领取的和要鼓励延后领取的。在大龄就业方面，美国政府也是相对成熟的，他们鼓励灵活用工，政府会有大量的扶持计划，比如 WIA 工

人计划、高级社区服务就业计划针对 55 岁以上的就业人员，还有专门的国家大龄员工就业中心是帮助退休或 40 以上失业的专门在环保、自然资源领域的计划，还有一些 NGO 组织对他们的技能进行培训，有大量的网站是专门给大龄人群提供职位。美国的第三产业比重逐步增加，目前已经超过 78%。美国老年社区的商业化发展非常迅猛，非常著名的就是太阳城中心，这样一个老年公寓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学习的标杆。另外是引入移民政策，美国已经连续几次将移民政策放宽，2003 年奥巴马上台之后推出一系列的积分计划、蓝卡转绿卡的制度去降低移民政策的门槛，也就是希望通过移民去解决他们的供给。他们将替代率逐步降低，已经从 41% 左右在 2013 年左右降到 38.3%。

研究结论：在深度老龄社会时出现养老金缴费率政治红线（封顶线）。在进入深度老龄化社区的时候，最低缴费率为 18%，已经对企业发展，青年人买房子、养孩子造成一定威胁；到超级老龄化社会时的缴费率可能达到 35%，企业和青年职工是不能接受的。根据 OECD 国家的经验，进入到成绩老龄化社会的时候，对费率有 20% 的封顶线，他们可能通过其他的政策调整形成了一个平衡的机制，去保持费率相对稳定的状态，即使在老龄社会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也能保持费率的相对稳定。

这就是我的研究成果，希望供大家讨论，希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杨燕绥：秦勤这是一篇硕士论文，刚刚完成。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按说老年抚养负担越重费率越高，如果一再提高费率对企业就会杀鸡取卵，影响企业用工。保持养老金费率适中和不便，需要建立平衡机制，涉及六个变量。尽管研究成果很初步，但对中国恰逢其时，很值得大家思考。

下面请妥宏武博士讲一下他对现在社会公众不太理解延迟退休到底是从哪些方面考虑作个分析。

妥宏武：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我是清华公管院的博士生，我的导师是杨燕绥教授。今天我主要把从网络上怎么看延迟退休进行一个梳理。

主要分三个部分：一是网络上关于延迟退休有一些调查，这里选取一些调查结果进行展示；二是对延迟退休网络上的一些观点进行梳理和分析；三是关于在老龄化这样一个背景下，咱们怎么去做对于公众延迟退休的知识普及。

首先，看最近的几个网络调查，有新华网和互动社区、新浪财经的调查。从调查结果上看，不支持/反对的比例远远超于支持的比例。做的样本最多的是新浪财经，有 7 万多人，反对比例达到 6.5 万多。

对延迟退休可能带来的结果的看法，这是新华网做的一些调研。从比例中看，可能带来哪些好处呢？超过 50%的人选了“其他”。对于可能带来哪些不良后果，或者社会公众对延迟退休的担忧，第一个结果是对青年人就业会带来压力，第二个是工作岗位会撑不到 65 岁，比如体力劳动者会担心他的预期寿命达不到 65 岁。

关于延迟退休，网络上有一些分析，支持延迟退休的观点，第一个是延迟退休可以降低年龄一代的负担，主要是从人抚养比的角度，延迟退休可以使人口的抚养比提高。第二个是支持密集型单位的延迟退休已成为惯例，同时差别年龄的退休政策造成了女性人才的浪费和流失，主要是指女职工 50 岁、女干部 55 岁，退而不休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第三个是推迟退休年龄是解决中国社保问题，既开源也可以截留，开源是增加收入，截留是减少支出，推迟退休年龄既可以增加当期收入，比如今年退休的人减少，领取养老金的数量就可以减少了。

不支持延迟退休有以下观点：第一，延迟退休违背契约精神，以牺牲政府信誉为代价。这个怎么理解呢？刚才介绍了，咱们国家的退休政策是有相关政策和制度规定的，规定退休年龄是 60 或 55，如果现在提出延迟退休，实际上是违背了政府契约。第二，当前我国并不具备延迟退休的社会基础，这是从国家对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投入的角度去理解的。咱们国家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大概占财政支出的 11%左右，远低于欧美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三，现行抚养比降低会导致缺口，这忽略了经济增长与生产率提高，很多学者和社会公众认为生产率的提高，即使人口抚养比降低了，也不影响养老金的缺口。也就是说，比如人口抚养比是三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以后人口抚养比提高了，可能会养两个老人。第四，养老金缺口可以通过国企红利补贴、外汇储备金投资收益或者开放计划生育等方式来解决，这里忽略了一些现象，目前国企红利和国有资产怎么补充社保基金没有一个操作化的定义；第二，到底是补充基本养老保险是补充基本养老保险还是整个补充，都没有操作的定义。外汇储备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开放计划生育面临时间来不及的问题，同时也会造成社会负担增加。第五是延迟退休年龄会对青年就业形成挤压，这是网络上很多人的担心。

还有关于延迟退休的其他观点，一是延迟退休应基于公平原则实现社会共识，指的是要考虑不同群体的利益；二是延迟退休应谋求社会最大公约数，也就是说要考虑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不同的利益，同时，政策的实施要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三是提出一个协商手段，咱们提出延迟退休，包括弹性退休，都面临一个问题，即个人职工跟企业之间需要协商。大家都知道，养老金个人缴纳 8%，企业缴纳 20%，如果延迟退休，企业的成本也会增加，如果说让职工自主去选择退休，这里涉及到企业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所以这里提出需要个人、企业以及政府去协商到底怎么去制定延迟退休的政策；四是由国民自己决定何时退休，国家只

是规定一个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法定年龄，实现早减晚增的措施。如果早退休，领取到的养老金会少一些，晚退休，领取到的养老金会多一些，通过这种方式引导国民增加工作和积累养老资产。就业困难人群和就业优势人群均反对强制延退，如果刚才说大部分人反对一刀切，可能大部分人都是不同意的，如果让他们有选择地去选择适合自己的退休年龄，这样的政策推行起来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为什么社会公众对延迟退休不理解，反对声音比较大呢？其实咱们国家对于养老保障知识和人口相关知识的普及程度是不够的，以下四点需要今后重点去普及：一是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现在已经阻止不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了，我们要考虑的只是怎么去积极应对它。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会增加企业和职工的负担，减少就业、税收和消费，会出现社会保险基金入不敷出的问题。二是延迟退休与就业的互动，目前学术界也是有两种研究成果，延迟退休到底和就业的关系是怎样的，现在没有明确结论。如果处理得好，延迟退休可以增加消费和带动就业，并不是说延迟退休一定会挤占青年人的就业岗位。三是需要让社会公众分清楚这两个概念，一是领取全额养老金年龄的时间，二是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对于国家来说，只能规定领取全额养老金年龄的时间，职工自主决定他什么时候退出劳动力市场，他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这个概念也是需要普及的。四是养老金的二元结构，国家的责任在于提供基础养老金，而个人账户的作用是用于积累资产的投资，改善自己的养老生活。国民需要缴纳养老金税费也要为个人积累养老资产，实现老年的财务独立。可能目前社会公众对于我国的养老金模式不太清楚，咱们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简单理解是年轻人在养现在退休的人，它跟有些国家实行的完全积累制是不同的，但是社会公众对于这个没有明确认识，有人会拿这个去比较。

以上是我的汇报内容，希望大家指正，谢谢大家。

杨燕绥：下面请胡乃军老师介绍基于北大 Charles 系统，关于延迟退休民意的分析结果。

胡乃军：我们的分析刚刚开始，还没有完成，之所以选取 Charles 数据库，也是希望拿到的关于退休年龄选择和相关引路的实际社会调查数据，3 月份我们刚拿到 Charles 数据库，这是 2013 年的 Charles 数据库，我们想找到影响退休年龄的因素。我们初步假定人是理性的，所以他的选择背后是有一些原则的，我们想象是包括收入、健康状况、就业等。由于数据统计的比较初步，我今天介绍一部分。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数据库 2013 年调查了 45 岁以上居民 18326 人，男性 8375 人，女性 9521 人，但是这 18326 人中，既有退休的，也有没退休的，只有 236 人填写了他们是所谓的“正

式编制”，目前有 3219 人填写目前他们在工作，这其中大部分都是个体经营，占了将近一小半，879 人在企业，只有 351 人在事业单位，266 人在政府部门。当然还有其他分布，比如农户、居民户。

有 1125 人对他自己在这个单位工作的年限作了选择，125 人选择超过三年，这 1125 人中有 174 人选择他们是因为到了退休年龄选择停止工作。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选择停止工作，比如因为正常的合同到期，没有书面合同，但是约定时间到了，比如估计雇主会让其辞职，也就是说选择停止工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只有一部分人选择因为退休年龄到了而停止工作。

当问到你所在单位是否会为你办理退休手续，有 2809 人选择了回答，2254 人选择单位不办理，这其实都是非正式用工，只有 555 人选择了单位会为其办理退休手续。下一步是我们找到的关键问题，你到底哪一岁办理退休？555 人将要在自己单位退休的人里，325 人选择 60 岁，121 人选择 55 岁，这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制度上的所谓的退休年龄是比较接近的，只有 15 人选择会在 60 岁以后退休。我们可以看到，55 岁和 60 岁是比较多的，但是 60 岁以上的目前选择只有 15 人。

这 18000 多人当中，有 165 人提供了税后年收入，最小值 600，最大值是 72000，均值是 25066 元，收入 5 万以上的只有 15 人，年收入 10 万元以上的只有 3 人。现在整体 45 岁以上的群体收入水平比较偏低，而且分布极不均匀。如果用基尼系数算的话，这个基尼系数将相当大。

下面重点就三个群体作个分析，比如选择 50-55 岁退休的群体有 194 人，男性 92 人，女性 102 人。问他们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年龄段退休？只有 20 人选择是因为到了正式退休年龄于是退休，这其中有 34 人为政府部门工作，82 人是事业单位，69 人为企业。他们现在平均税后收入是 2599 元，标准差是 1515 元。

选择 50 岁到 60 岁年龄段退休的群体是 327 人，52 人男性，175 人女性，46 人为企业工作，43 人为事业单位工作，15 人为政府部门工作。这 327 人选择因为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所以退休。但是这部分群体的平均月收入是 3114 元，标准差为 1914 元。

选择 61 岁以上退休的群体只有 15 人，其中有 9 人是女性，6 人为男性。原来我们想象选择 61 岁以上的人可能男性比女性更多，但是现在来看女性稍多，他们的月收入整体偏高，工作性质整体偏于事业单位，在政府的有几个，4 人是企业，个体户没有。共有 15 人，9 人为男性，6 人为女性，7 人是事业单位，4 人是企业，3 人是政府部门，一人是 NGO，4 人具有高级职称，而且这 15 人全部是有编制和正式工作合同。但是这里面只有一个人选择是因为到了退休年龄而到达退休的，所以我们想，选择 61 岁以上退休的人都是突破了现在的退休年龄政策。这 15 人的平均月收入大概是 3046 元，标准差是 1024 元。

简单地分析，45 岁以上群体的正规就业比例是比较低的，只有 3219 人在工作，而且这些群体对未来工作的预期是较为短暂的，1125 人选择超过 3 年，大部分选择不到一年或者两年。整体上没有形成制度，只有 555 人选择会在这个单位退休，有 2254 人选择了我虽然现在在这个单位工作，但是我不在这个单位退休。整体未退休的群体退休预期较早，555 人中只有 15 人选择 61 岁以后退休。45 岁以上群体收入差距较大，只有 10 人收入 5 万以上，3 人 10 万以上。

50 岁到 60 岁依然是主要的选择退休年龄的区间，555 人中有 324 人选择在这个年龄段。选择退休年龄 61 岁以上的人平均收入较高，标准差最小。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男性和女性没有明显的选择退休年龄的差异，在三个年龄群体里并没有看到男性比女性多。选择 61 岁以上退休的群体，15 个人里主要是在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他们既然不是因为到了退休年龄而退休，可以自己选择，说明他们可以选择较晚的退休年龄。

这是我通过 Charles 数据库的一些初步提取，谢谢大家。

杨燕绥：我最后把我们团队这几年来的研究成果给大家作个汇报，其实我经常出思想，很多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相关研究，在论证这写思想的真伪。

既然延迟退休是客观问题，怎么才能先说清利民问题，在说利国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民生问题。大家以后可以跟踪我们《中国老龄社会和养老保障发展》系列报告，这个报告去年已经开始发布，以后每年 2 月份两会之前发布指数，9 月老人节之前发布研究报告。

延迟退休是有客观时间表的，动作越早速度越慢，动作越晚速度越快，中国已经慢了一拍，但是现实又快不得。

首先，关于老龄社会的时间表，给出一个倒计时策略。一个基本的问题是谁是老人？大家都开始要关心国民的预期寿命，这个预期寿命减去养老金的平均支付期数，最长 15 年。2014 年城市的平均预期寿命是 78 岁， $78-15=63$ 岁。我们对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是将人口知识写进小学课本，让小学生都知道在祖国大家庭里，2014 年谁是老人。

当老年人占总人口 7% 的时候，另外一个数据就出现了，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例将会是 10: 1，减去在校生、失业的和因为各种原因提前退休的，很可能会出现 5:1。把统计赡养比转化为实际赡养比，如果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养老金替代率不低于 50% 的话，费率就是 10%，每个人要拿出 10 块钱去养老人。到 14% 的时候，就会出现 5: 1，减去在校生、失业的，就会出现 3: 1，养老金替代率不变，费率就会上到 17%。如果再继续下去，到了超级老龄社会，这个费率会到 25% 以上，赡养比对费率有影响。刚才秦勤同学的研究就是西方国家到了这个费率就不变了，如果再高，年轻人就会非常颓废，不相信养老金计划。按照这样一个时间表，中国大约是 2000

年前进入，2025年前深度，2038年前超级，但是取决于我们总和生育率。现在的测算应该是1.8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如果总和生育率下降，这个老龄时间表就会发展得更快。

一个倒计时的策略即随着老龄时间表，未雨绸缪地做如下事情：

当这个国家进入老龄社会的时候必须做到养老金制度全覆盖，给每一个老人一个安全的预期。养老保障包括养老金、医疗、居住和护理，要同时启动延迟问题。中国在1996-2000年间进入老龄社会，这时候正是国企改革、养老金改革、银行改革，在这个时点上我们用提前退休解决国企减员增效问题；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政府、事业单位和企业还是用提前退休来解决单位绩效，在概念上与老龄社会反差较大。在这个阶段上就要注意怎么增加劳动力供给，不让劳动力成本简单地变成制度成本迅速上升，要注意养老基金的收支平衡，更要关注养老资产的积累。

到深度老龄社会时，统计赡养比5:1，实际赡养比3:1，费率17%，不能提高了，怎么办？养老金改革的关键问题是调结构，就是公共品、准公共品，一个保基本，一个保改善，而同时加速延迟，因为他们的平均寿命到这个时候基本超过了80岁，所以这个年龄都到65岁以上。

到超级老龄社会阶段，这个阶段基本上统计上两个多养一个，制度内不足两个就要供养一个老人，费率很可能会上升到25%，这时候怎么办？只能低耗能、高效率地解决问题，我们叫强化管理，而且再小步延迟到70。

在这个时候，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解决有备而老，不管通过工资分配还是养老金的分配或养老金制度结构，就是要解决老年人的资产结构。刚才都阳老师讲了，我们提高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是可以解决老龄化问题，过去5个人工作，现在两个人工作，解决老龄化的问题。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两个人工作去供养老人，他们的人力资本了，实际的问题是谁为年轻人买单？所以改变老年人资产结构就非常关键，资产结构从转移支付、劳动经营收入、资本利得。最好的是美国，转移支付、劳动经营收入、资本利得各占1/3，这是带着一个软实力进入老龄社会。中国的六普数据看不太好，所以我很同情年轻人，49%家里养老人，29%去缴费养别人的老人，靠劳动还是我们的城镇化之前的人，他们一旦进入了城镇化，也不可能靠劳动了，所以显然年轻人未来的负担是相当重的。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我们的农村老人是有土地的，城市老人是有房产的，怎么能使他们在经营当中获益，改变他们的收入状况。所以，有备而老，进入老龄社会一个非常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老年人口的消费。我们从中国的六普看，消费的基本方法是看一年消费多少，应该是一个平均，它会有一些波动，但是不能太大。从0岁到90岁看，情况是非常糟糕的，第一个高点是12-13岁的孩子花钱最多，大家都知道为什么。第二个高点是30岁的花钱最多，大家更知道为什么了。这就导致在孩子出现消费高点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消费就非常低，所以中国30岁到60岁的劳动人口消费非常低，尤其当儿子要结婚、老人要看病，

他们的消费已经降到平均消费的最低点。一个国家如果劳动人口不消费，大家知道后果是什么。第三个高点是 70 岁，显然是看病，我们实行了全民医疗保险，马上就见效了。没有教育资源的公平，没有首住房制度，这两个高点把中国人的消费曲线拉得是乱七八糟，非常糟糕。所以中年人不买健康、不买知识、不买旅游，老年人占的比例越来越多，他们不消费，最后是快死了去消费，这也一个副作用。我们可以看到，用什么样的消费去拉动中国经济，中国的消费怎么变得科学，这是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美国今年才算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的第一年，它的消费是十几岁到 30 岁的人一个小高峰，30-70 岁的人一个大高峰，显然美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和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劳动人口是相反的。

现在先行进入超级老龄社会的国家，日本、德国和瑞典，他们是 50 岁到 80 岁的人在消费，显然就是你要积累好，到老龄社会，要用老龄人口消费来拉动经济。大家都去出国考察，考察以后都觉得国外挺和谐的，尽管已经超级老龄社会，GDP 比较低，但社会比较和谐，其实是他们提前了 30 年以上开始作准备。

延迟退休是需要一些配套措施的，不是简单的年龄上的计算，一年减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其实它是涉及非常多方面的社会工程。从配套措施来看，首先需要国民老龄化教育，这种教育需要提前。去年 4 月份澳大利亚的财政次长向澳大利亚宣布，1965 年出生的人 70 岁领养老金，社会很平静，为什么？因为这是 2035 年的事情，但是政府在 2014 年就公布了，他有 21 年的准备时间。其实这个国民教育非常关键，人口结构与老龄社会的影响真的应该进小学和中学课本，我们的建议已经上去了，不知道最后“十三五”规划中是否能表述出来。

养老金的结构和理财风险管理。养老金的结构非常关键，当一个国家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的时候，年轻人就看清了一个问题，这个国家老龄化了，这时候还让年轻人交很多费率，大家是没有信心的，会认为我现在交的费用将来拿不回来，所以年轻人会想尽办法去灰色就业，逃税，这些对公共政策是致命的问题，所以你无论花多么大的管理成本都无法改变这种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国家调整养老金结构会非常关键。刚才我在学院另一个论坛上问我们年轻的杨副院长，现在让你拿出 10 块钱去交养老金，3 块钱进公共账户，和别人互济，7 块钱进你个人账户，你交不交？他说交，因为 7 块钱进你的个人账户，雇主再给你配款，政府对你税收让利，市场投资的红利再向你分配，你每多干一年就能看得见几万养老金出来了，这时候其实是对个人极大的激励。我们看其他国家，很多国家在 80 年代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建个人账户的速度，随着老龄化的程度开始建立和完善他们的个人账户，所以 2008 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市场化运营的个人账户资金已经达到了 31.9 万亿美金，到 2008 年减少了 15%，剩 25 万亿，但是 09、10、12、13，全球经济并没有复苏，但是养老金积累又涨回来了，为什么回来？因为各国采取了很多投资策

略和分配上的变化，确保这个养老金还是在增值的。

这时候，其实养老金结构调整非常关键，中国的今年应该到了养老金结构调整的关键时刻，中国 1998 年养老金改革的时候，当时的总理还是头脑清楚的，他说这个养老金制度是统账结合，统就是个公共品，账就是一个个人积累，但是在同年国企改革，2500 多万国企职工下岗，减员增效，他们的几十年工龄视同缴费，没有计算，这个制度一直到今天，楼继伟不好办了，这三万亿到底还不还？现在关于个人账户怎么办，今年中国正是个十字路口，有三种观点，一种是大账户，个人账户全不认帐了，都进统筹。第二种观点是名义账户，个人账户还认账，但是钱是空的，将来再还，还有一种观点比较多，把 8% 的个人账户分开，3% 进社会统筹，5% 进个人账户，年轻人会鼓掌的，年轻人和老人之间要达成共识，可以 4% 进统筹，4% 进个人账户，总之，要给年轻人留一个个人积累，否则年轻人会拒绝参保，这就是最大的政治风险。到了这个时候，其实养老金非常关键。

我们现在要请全世界养老金公司和专家给我们作报告，他们每每讲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什么投资收益、投资策略，这一个问题都是国民教育，要告诉国民养老金要怎么投资，它有什么风险，这个国民教育帮助了政府，也帮助了国民成长。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清理那些鼓励提前退休的各类政策，因为这是个误导。我们刚才分析的很多原因，那些原因是表面，我们不能说中国老百姓就懒，中国的老百姓就不理智，其实我们从进入老龄社会、国企改革、养老金改革，一直到今天我们所有的政策都是鼓励提前退休的。现在无论政府还是单位、机关、事业单位，都是这样，用提前退休来解决单位绩效，这是和快速老龄化一个非常相悖的行为。我们的建议是，人口风险问题一定要进中央党校，让我们的领导知道这是新常态下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些都要进入教育。

很多老师都讲到，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才有弹性就业政策来帮助大龄人员就业，让他们进入轻体力、近距离、灵活工作时间，但如果让他们进入灵活时间的工作，我们的社保费是按人头交还是按小时交？其实西方国家 70 年代就按小时交了。当时我留学的时候，我同屋的一个教授的秘书是 1/10 劳动合同，一星期就干半天，所以我们的教授给他交 1/10 养老金，就是养老金、社保费、税都按小时计算。灵活也要规范，多一个不规范就是将来政府的负债，所以我们的政策要变革。

怎么降低大龄人员的就业费率？比如 24% 的住房公积金还交不交？生育保险还交不交？怎么能降低他们的费率，鼓励企业用工？怎么能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一老一小的服务，这些都是综合战略来支持大龄人员就业参与率。

最后是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世界各国 DB 计划基本实现早减晚增，DC 计划自己定。

到 2015 年，很多国家已经深度老龄社会了。我们看养老金的结构，公共养老金是在下降的，劳工组织在 1952 年提出的替代率是 55%，到 64 年的建议书是 45%，其实各个国家的公共养老金降得很低了，他们用职业年金个人账户来替代，总养老金不变，形成了二元结构的态势。

我们看 OECD 国家，其实这个年代是他们深度老龄社会的末期，有些国家已经开始进入超级老龄社会，所以大家要非常关注老龄化时间表，这是我们看新常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然后再倒计时地解决问题。这些国家基本在深度老龄社会的末期，让他们领取法定养老金的年龄有的已经开始缓慢地向 70 岁延伸，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走向超级老龄社会的速度快了。其实从进入老龄社会到深度老龄社会时间比较长，但是这时候囤的六七十岁的人是比较多的，所以从深度老龄社会到超级老龄社会，世界各国都不超 20 年，速度非常快，这时候一些理智的国家开始缓慢地向 70 岁领养老金进军。但是这是一个领法定养老金的年龄，而他们实际退出劳动力市场退休的年龄是不一样的，而且男女多少是有一点差异的。但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劳动力市场的治理是非常好的，政府知道谁在什么时候是真正退出劳动力市场，他稳定的劳动和经营收入已经停止了，政府是非常知道的，我们的政府可能是不知道的。

我们再看他们的 DB 计划，像奥地利，如果你是 DB 计划，65 岁领养老金，62 岁可以提前领，每提前一年减 5.1，每退休一年增 4.2，DB 计划大部分都是早减晚增。这就告诉我们，延迟不是一个年龄和算数题，它是建一个机制，因为国家的责任是必须规定一个领法定养老金全额养老金的时间，这个时间是个政治问题，你要保证费率稳定，企业能生存，年龄人也能生存，必须让两代之间和谐，还必须让养老金平衡，这是个政治问题。美国两个党为医疗打得一塌糊涂，养老金他们从来不打，他们特怕养老金捣乱，这个政党一下去涨 10%，下一个政党上去再涨 10%，下一个政党再上的时候没法涨了，因为没钱了。所以养老金让他们不打架，医疗他们打得一塌糊涂，所以这里其实有个政治问题。政府一定要对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法定年龄做出公开的规定，然后早减晚增，变成一个机制。

DC 大部分国家自愿。所以建立个人账户还有一个价值，尤其是美国 401K 个人户，为什么 59 岁半开始领？就是让你解决延迟的时候，67 岁前国家基本养老金领不着的时候，这 10 年你就领自己的，为什么 70 岁半必须花掉，就是让这些人赶快花钱，给年轻人创造岗位，消费拉动，其实这就是公共政策要起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延迟退休的问题，政府要规定的是延迟领取养老金，或者是规定一个按照平均寿命现在应该发生的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然后早减晚增，让人们自己选择。其实一个人什么时候进入劳动力市场，什么时候退出劳动力市场都是自己决定的，如果政府这时候强制人

们延迟退休，就会得罪弱势群体，如果延不了，也会得罪就业强势群体，因为他想延你不让延，他领了养老金再干三份你也管不了，这叫搭了便车，下车打草搂兔子，自己先实现小康社会，这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养老金市场两都是非常混乱的，所以会陷入一团恶性循环圈，我们看他们其实都是这样做下来的。

非全职工作就业占总就业量的比例告诉我们，到了深度老龄社会以后，非全职的灵活就业已经占到多数，但是有一点，非全职的灵活就业不等于非规范，所以要非全职也变成规范，我们的各种税费管理政策要改变，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按小时缴纳社保费。

第三，延迟退休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涉及一系列的系统工程。

中国马上就要进入深入讨论延迟退休方案，到 2022 年以后正式执行。到底什么样的政策最好呢？今天的共识是很多的，刚才几位老师都谈到有弹性是最好的，所以延迟退休的政策选择——弹性降风险，刚性增风险。如果特别刚性的话，大家都会认为这是政府一家的选择，如果你有弹性的话，大家都会认为最后的选择是我自己做的，而且老百姓会在你给出的选择中选择有利于他的一点，所以他的气就少了，社会风险就降低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政策保持弹性，甚至足够的弹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国家要规定领取全额养老金年龄，确保养老金费率合理，收支平衡，和谐代际关系。

二是建立早减晚增机制，个人决定何时退休和领取公共养老金，可以先领取 DC 个人账户资金，借鉴美国 401（K）的经验。

三是允许就业困难人员早 5-6 年领 70%-80% 养老金，因为这个人有各种原因，一、健康问题；二、家庭困难问题；三、就业转业培训资格问题。如果强制这些人延迟退休，可能整个延迟退休都做不到了，因为他们的呼声是最容易被大家同情的。如果允许他们早一点可以减少社会阻力，而由于早领，领的部分少了，其实到了 65 岁以后也还是这个比例，由于贡献少，领的时间长，这个比例对他们来说是合理的，其实最后会减少对这个人群的养老金支付总量，所以对个人、对社会、对这个群体都是不吃亏的。如果说这样做还有一点帕累托改进的味道，我们采取它还是有点价值的。

四是允许就业优势群体延迟领取，有效利用人力资本和扩大正规就业，增加养老金计划收入和减少支出，避免搭便车和打草搂兔子的公共悲剧。

我们国家已经晚了，按照时间表，我们应该在 2000 年就讨论这个问题，再像有些人讲的一年延一个月，这其实是一个幻想，因为这样延赶不上，还没延到那个时候，危机就已经来了，但是一年一年往下延确实有它的问题的。我们如果有弹性的话，有人选择延，有人选择不延，再加上出生，一年 365 天每天都有人出生，其实这个问题就变得平滑和弹性了。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基点——银发经济。不要认为老龄化很可怕，人口老龄化不等于社会老化，如果有备而老，其实老龄社会本身是一个发达、幸福的象征，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高级阶段才发生的。所以我们说以后不要讲暮色经济那么灰暗的东西，其实它是一个银发经济。它的内涵，孩子们出生之后健康成长，工人健康劳动，老年人健康长寿，这就说明国家经济发达，社会进入买方市场，其实在买方市场生产力相对发达、有一定过剩，这时候社会经济发展的内涵是需要需求拉动的，而需求拉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老年人口这个越来越大的消费拉动作用。所以在西方大家都可以看到老年人的消费是非常从容的，因为他一生的劳动，他个人努力和国家给他的分配足以让他老年坐在那里经济是独立的，这是进入老龄社会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老年人的需求拉动，青年劳动人口的科技推动应该是我们进入银发经济发展的两个内涵。

那么，我们非常需要关注老龄人口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购买能力是什么，来满足这个有效需求，然后我们的供给又是什么。归纳起来，老龄社会银发经济发展战略，两句话，这两句话是我们团队集体的研究成果，能不能概括各种研究？而且我们非常希望这两句话能进入“十三五”规划。第一，改善老龄人口资产结构以提高购买力，说穿了，为年轻人买单，年轻人念了那么多年书，本科生出来想要 3800，硕士出来想要 5600，博士出来想要 1 万，我可以创造过去 5 个人的劳动力，但付出了，谁买单？不要认为政府可以买单，政府买单逼急了就卖地了，所以老年人口必须为年轻人买单，这就是现在老年经济学讲的问题。第二是改善劳动人口人力资本，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两个孩子做了五个孩子的事，我们不怕劳动人口的减少，我们最怕老龄人不买单。只有这两者的和谐，老年经济是银发经济，它仍然是一个和谐的、发达的经济，这就是有备而老，我们的发展战略。

这是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集中给大家汇报。

下面进入讨论阶段，请三位专家讲讲，然后进行讨论。

首先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唐钧老师讲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唐钧：首先感谢杨老师，如果说延迟退休的问题对中国社会是影响那么大一个问题的话，政府部门其实早就应该有这样的场合，大家来发表不同的意见，所以我特别要感谢杨老师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我跟大家讨论，来谈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因为以前我的看法只能在媒体上发表，总是会有一些偏的东西。媒体比较希望我和杨老师成为 PK 的对手，我们俩也曾经非常友好地 PK 过一次，各说各的观点。

今天我听了刚才所有的报告以后，对杨老师最后的做法还是非常认可的，当然有一些地方

还需要修正，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两个讨论的结果，有很多东西跟上一次您发表的那篇文章已经有很多改进。

但是还是有一点问题，首先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是有点反感的，我觉得杨老师是不是挖了一个个坑让我跳？因为她已经说了延迟退休利民利国，我不认可这个题目，但是恰恰我们现在的讨论就是设定了一个既定的前提，就是政府的一个意向，然后我们大家去为它做正名，在这个社会上这样的研究太多了，我觉得我是非常孤单。今天听了都阳老师的，我非常高兴，我觉得他的观点跟我非常一致。

我只想做一个课题，就是把老龄化、就业和人口这三者放到一起来讨论，放到一起作一个研究，因为割裂开来的研究是得不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的。

我们现在研究这个问题，一定要跳出一个保险的框框，一定要跳出收多少钱、发多少钱、多少人交钱、多少人领钱这个框框，这点我还是不太同意杨老师讲的，其实不是光用跟年轻人收费的这种办法来满足我们老年人需要，这种渠道还是应该很多的，不是只有这一个渠道，而且这样一个渠道其实是没有出路的，是一个准庞氏骗局，庞氏骗局好像是我故意来骗你，我不是故意来骗你，但是会形成这样一个结果。为什么呢？因为保险和社会保险是不一样的，保险的承诺是将来我给你多少钱，这是容易做到的，不管这个社会怎么变化，物价怎么变化，我说了到 60 岁以后每个月给你 4000 块钱，那就是 4000 块钱。有了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们可以做精算。现在社会保险的一个承诺是保证基本生活，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实际上现在大家都在做精算，精算可以作参考，但是我今天敢这么说，将来的发展一定不会按照你那个精算去走的，我们能够看到今后 5 年、10 年就不错了，你说今后 70 年你都算出来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用一个不确定的结果去做保险，所以它的结果可能跟庞氏骗局非常相象。所以，为什么说所有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最后都有一个政府的出资呢？我们现在只强调双方——企业和个人——是不对的，一定是有第三方——政府，按美国人的说法，政府扮演最后兜底的角色，这是一定的。虽然现在美国人延迟退休想维持社会保险的基金能够平衡，但是我可以预言，10 年、20 年以后它做不到这个，还是因为老龄化。还有一点，我们的投资市场现在是太不确定了，有人说你去买股票，如果 20 年、30 年来算，最多做到不赔不赚。所以你说投资能够维持多少多少钱，能够运转来多少多少钱，这是一个金融的假象。而且政府如果储备一笔钱去将来作为一个准备金的话，其实跟印钞票的效果是一样的，这笔钱一直不用，到时候需要用了，我把这笔钱拿出来。因为政府有两个特权，第一个它可以执政，第二个它可以印钞票，你想想，它跟印钞票的效果是不是非常接近？但是在一个社会中，永远是年轻人养老人，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你生产的物质财富怎么去养老人，那么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你退休的时候可以拿多少养老金，

不是说现在所有的一系列的计算、一系列的规定到那时候就这样，一定不是那样的，决定你领多少养老金的是在你退休的时候这个社会能生产多少财富，这是第一个，财富越多越好。第二个，我们怎么去分配这些财富。是这两个因素决定了你可以拿多少养老金。所以我觉得，养老金的问题是一个社会分配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跳出保险的框框。

我现在非常害怕的一个词就是“顶层设计”，我觉得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讲，顶层设计已经变成一种指令性计划，好像是在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做所谓的市场经济，这是很可怕的，将来会出很多问题。

刚才汪泽英老师讲了很多好处，杨老师也讲了人的一生的财富应该怎么去分配、怎么去策划，其实这对中国人来讲是非常难的，对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讲是非常难。我们一讲就是要跟发达国家比，其实中国的国情真的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尤其是现在，起码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我们最担心的这一拨人跟国外的 50 后到 70 后完全不一样，国外的 50 后到 70 后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他们那时候有大量的积蓄，所以他们现在非常有钱。而中国这一代人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下，所以他们是最没有钱的。所以我们不要简单地比国外可以做，我们可以怎么做，这是一个误区，我们在讲国际经验的时候一定要回想一下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

汪泽英老师讲了很多好处，但是我觉得这些好处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国人大多数的劳动者是蓝领工人，实际上他们是没有办法去安排自己的一生，我怎么安排得好好的，我老了还有很多钱。

现在讲得比较多的是一年延多少，刚才杨老师也反对了，我很高兴，一年延一个月或者是四年延一年，这其实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策略，好像你觉得大家会接受，其实比较难。美国其实是两个坎，20 年一个坎，20 年延到 65 岁，再 20 年延到 67 岁，这两个坎，确实感觉没有了。你隔一年延一次，应该今年退休的，我今年不退了，每年 61，我又退不了了，实际上一下子等于要延到 5 年以后。这个温水煮青蛙的策略是不好的，老百姓会认为你在愚弄我。真正地讲延迟退休，从国际上来看是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而不是为了节约养老保险基金，这是肯定的。我的估计，在中国人口老龄化最高峰的时候，中国还有 7 亿劳动力，大家想想 7 亿劳动力是什么概念？现在所有国家老龄化的状况实际上都没法跟中国相比，因为中国是一个现在就有将近 14 亿人口的大国，世界上还没有这么一个大国进入老龄化，所以其他国家的经验对我们来讲可以参考，但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了，一定跟他们不一样，中国有 7 亿劳动力，我们可以创造多大规模的经济规模，这是最重要的。

都阳老师讲了教育的因素，实际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科技进步，科技进步会大大

提高我们的生产率，我们中国的生产率现在很低很低，好像只有韩国的 1/6，美国的 1/13，这个提高的空间很大。实际上，比如两个家庭都是三口之家，两个孩子带一个老人，有一个老人很会挣钱，一个家庭不太会挣钱，你说这个老人过的日子能一样吗？所以实际上我们的着重点还是要发展经济，要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从这个上面去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这个框框里去讨论是讨论不出结果的，可以做参考，但是一定不要按照这个思路去做我们的政策，这样会出事的。

有一个问题，今天所有的发言人都在那儿回避，都没有讲，你说推迟到 60 岁，你把 50 岁或 55 岁的往后推，或者 60 岁的往后推。推的时候，你说他们能够做到工作吗？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 70 以上都是蓝领工人，女性在 40 岁以后、男性在 50 岁以后，一定会碰到一个就业困难期，会被老板辞退，找不到工作。现在我们的如意算盘是我把你推迟了，你不但不能领养老金，还得交养老费，你想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厦门的公共汽车纵火案，为什么会酿成这样一件惨案？就是因为推迟退休一年，他认为他今年应该退休了，但是人社局告诉他，不对，你算错了，你应该明年退休，就是这个原因。这个事一定不能小看，因为这一代人太苦了，我们高中聚会有一部分人是不来的，为什么？上了大学的人都来，没上大学的人都是下岗工人，他们跟我一样年龄的人已经退休了，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没有退休，你现在给他延迟退休，他不跟你急？像这个事情一定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一个可以计算的问题，它的根本背后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最近看了很多关于福利的讨论，其实我觉得国际上的一个评论都是讲福利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我们不可以大意。我们老说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实孔子还有一句话“不患贫而患不安”，就是我现在穷一点可以忍受，但是看不到前景的话，这个社会会乱。其实台湾发生的事情、香港发生的事情，都是因为青年人看不到前景。

刚才有很多人讲到现在的退休年龄特别早，其实这个问题对延迟退休是一个反证，大家喜欢用这个来证明我们应该延迟退休年龄，其实也就是说，现行的退休年龄你都做不到，何况你还要延迟呢？肯定做不到。因为现在做不到一定有它的原因，不是法律规定了再往后延 5 年你就可以做到了，不是这么一回事。

刚才和路锦非老师交流了一下，统一了一下，现在我也理解她了。她讲到现在的 70 后 20 年以后进入老龄了，但是这 20 年当中我们还得生孩子。如果仅仅按照现在的自然增长率去计算的话，现在我们所有的计算都算得比较少，但是这一块我们是有办法的。如果我们对老年抚养比那么担忧的话，唯一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放开计划生育，甚至于反过来讲，计划生育不一定是少生孩子，因为你真正要计划的话，大家不肯生的时候，你得鼓励他生，那也叫计划生育。

我觉得，在中国甚至要走向鼓励生育，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减缓我们的老龄化高峰的到来以及减缓我们的抚养比，推迟退休年龄对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一点作用，反而有一点坏作用。什么叫坏作用？你别以为 50 岁退休的大妈都去跳广场舞了，其实她们一天到晚最主要的工作是带孩子，或者家里有老人的还要服侍人，得闲的时候才跳一点广场舞。中国 0 到 3 岁的孩子有公共服务吗？没有任何公共服务。如果把这些大妈都延迟到 65 岁的时候，谁带孩子？所以它对计划生育一定是有影响的。在场年轻的女孩儿很多，你们想想，你们想到要生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跟你妈什么时候退休有关？所以，不是你考虑这一个问题它就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问题是很多社会问题都千丝万缕地纠缠在一起的。

我最近在看帕森斯（音）和斯梅尔色（音）写的《经济社会学》，里面讲到经济学这种方法一个缺陷就是把试验里面设定了很多条件计算出来的东西拿出来当作一个社会现实，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很多研究就是在犯这样的错误。

中国和很多发达国家还有一个不同是阶层结构的不同，发达国家都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以白领为主的，相对而言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延迟退休，所以为什么有的国家没有什么反应呢？因为主要是白领，白领多坐几年办公室无所谓。但是中国 70% 都是蓝领工人，我们有两亿八千万的农民工，如果要延迟领取退休金年龄的话，对他们来讲面临着什么？而且我们说，我们可以退休而不领养老金，但是对于这么多蓝领工人来讲，退休金几乎就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所以，我不赞同延迟退休“利国利民”，反过来我就不说了，真的会造成中国大乱的，真的，大家一定要小心。但是我现在跟杨老师已经统一到一条线，弹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研究的出路。

我希望学社会保障的同学一定看一些东西，就是关于社会保护这个概念。其实现在国际上已经不太讲社会保障了，取而代之的一个词是“社会保护”，在国内这方面的资料可能比较少，但是大家还是要去尽量看，无论是国际劳工组织还是世界银行都在讲社会保护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已经把保护的范围扩大到跟社会政策的范围差不多了，住房、教育这些统统都包括进去，而对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看到了它的很多缺陷，至少国际劳工组织发现，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其实世界上能够做到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做得比较好的国家还不到 20%，所以他们觉得必须要改变一个思路。我总结，新思路当中强调两点，一点是社会服务，一点是社会转移，即转移支付。当然归根到底这个是生产的人出，但是不一定是我跟你收费，社会转移支付是很重要的。我们也不要过于强调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一定要，但是你想，中国可能有不少人你给他个人账户他也建不起来？处于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觉得转移支付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只能简单讲这样一些，就今天听到的有感而发，如果你们觉得有必要的話，哪天给我三

个小时好好讲一讲。

杨燕绥：你说的社会转移支付怎么转？

唐钧：就是非支付的。社会服务基本上是实物加服务，社会转移实际上是资金的转移。

杨燕绥：你说还得靠社会转移支付，这个转移支付不是靠支出？

唐钧：非缴费的。

杨燕绥：年轻人创造出的财富直接分配给老人？

唐钧：对。我们现在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是老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就是年轻人生产的东西是很有限的，但我刚才讲了科技进步，我们提高劳动生产率，那时候你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像你现在想象的这样的东西。

胡乃军：您说的是不是和国家账户类似？

唐钧：包括慈善，包括社会组织，现在非常强调社会。希望大家去关注这个新概念，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真的是落后了，其实 90 年代就开始了。

杨燕绥：下面请中国对外交流中心信息部姜春力主任讲讲对这些问题的想法。

姜春力：首先非常感谢杨教授邀请我参加这个研讨会，一方面真的是向大家来学习的，杨教授、唐教授对社会保障的研究有很多年的积累和很深度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这次研讨会发表的报告也都是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观点，比如从政策的角度讲，有汪泽英老师，有从人的生命周期来谈论的，也有从劳动力市场供给的角度，还有从社会反应做了社会调查的角度，从各个角度对延迟退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从这次会上感觉确实收获很大。

第二，杨教授是很有包容性的，不光是赞成的角度，像唐教授，一直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刚才唐老师也把自己的观点看法说明了。

我想，做研究或者做任何一个政策，一定是各方面都要提出你的观点，不能说一边倒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如果是一边倒提出观点的话，我倒觉得政策有问题，你反而不能决策了，你要慎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艾森豪威尔有一个参谋，二战结束以后这个参谋跟他提出辞职，艾森豪威尔说你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呢？参谋说，每次你提出什么观点，我老是反对，现在仗也打完了，我再反对你，估计我也待不下去了，我还是自己提前要求走吧。艾森豪威尔说，我从来没觉得你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多余的，我对你提出的意见从来是充分重视的，如果你要离开了，我做决策反而缺少了对立面，我的考虑反而不全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制定政策和做研究，一定要有对立面，这样你才能把各方面的因素考虑得更充分。就像杨教授说的，我们的机构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我们有一个宗旨是“创新求实、睿智兼容”，其中“睿智兼容”就是这个意思，即使你再做判断，你可能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有很多前瞻、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兼容，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就不能足够深入。

今天研究的延迟退休这个问题的提出，因为今天的题目是“延迟退休”，路锦非老师已经提出了，延迟的概念一定是有一个法定的时点，你才提到延迟，如果没有这个时点的话，谈不上延迟不延迟。我们在研究时点的时候才发现，现在大家公认这个时点是男同志 60 岁，女干部 55 岁，女职员 50 岁，如果是高温、井下和危险行业，男同志减 5 岁，女同志再减 5 岁，基本是这样的年龄，这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但是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法定退休年龄，咱们看社会保险法、公务员法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改革、机关单位职业年金改革，也都提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现在找找法定退休年龄，就是 195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提出的，那时候提出来是对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包括铁路、邮政、航运这些行业。到 1953 年的时候又进行了补充，变成女干部 55 岁。后来到了 1957 年的时候，又专门出了一个国务院关于机关干部退休处理的暂行办法，也是又明确了，男同志 60 岁，女同志 55 岁或者 50 岁。这个时点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定下来的，大家可以想想看，50 年、51 年的时候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才 52 岁左右，到 2014 年，城市平均寿命已经到了 78 岁，已经从 52 岁到 78 岁，长了 20 多岁，但是我们的退休年龄还跟 50 年代一样。如果按照人的预期寿命来看，50 年代的时候预期寿命才 52 岁，60 岁退休，说不定你还活不到 60 岁人就不在了，怎么可能 60 岁退休呢？所以反而那时候我们定的退休年龄比实际寿命还要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年龄问题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现在来讨论延迟退休并不是一个必须讨论的问题，而是我们对历史怎么看的问题。

第二个，关于“利民·利国”的问题。我想，咱们制定政策，咱们的国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先你任何政策的制定要对人民负责，有利于人民，如果像国民党时期，人家叫“中华民国”，也是把“民”放在前面，把“国”放在后面，你先得考虑国民的利益、大多数人的利益，

然后才能考虑国家的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制定政策首先要考虑人民的利益，刚才唐教授说的也站在大多数人的角度考虑，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从政府的角度考虑，肯定要解决现实的问题，最现实的问题包括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杨教授的报告里已经讲了，在 2000 年的时候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到去年我们的老龄化程度已经是 10.1%，而到 2025 年我们进入深度老龄化，2038 年进入超级老龄化。老龄化是一个很现实客观的问题，我们必须得采取措施怎么去应对，作为政府来说，我不能让他自然而然地去老，老的时候再倒退，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有备而老，这是政府承担的责任。

再一个，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政府不能说我们到那个时候再去研究，我们必须有一个参考的坐标。发达国家已经走过这段路，大部分发达国家 70 年代就进入老龄化，还有的发达国家 50 年代、20 年代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了，我们只能以他们作为参考目标，他们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吸取。这样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一个是研究我们的现实问题，再一个是研究国外的经验，从这两个角度研究我们的政策。这样来看，老龄化问题是我们研究延迟退休必须要解决的，路老师已经讲了，我们的劳动力供给现在已经开始逐渐减少，从 2012 年开始，原来我们一直提中国人口红利，价格低廉，大量而充足，但是从 2012 年开始，我们的劳动力供给已经进入了拐点，而且这种趋势是不可逆的。我们有一个研究数据，从 2010 年-2020 年期间，社会的劳动力要减少 2900 万，这个趋势已经不可逆转。这样说，我们必须要解决我们未来的劳动力供给问题。当然我们在考虑劳动力供给的同时也要考虑延迟退休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生产者知识结构会有影响，但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还是有学习能力的，也是积极要求学习的，这种知识变化对他们来说是有影响的，但是他们的学习能力还是会把他们的知识结构提高。就像唐老师讲的，就整个社会来说，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我们更多地希望年轻人来就业，岁数大的人退休。但实际上现在来看，岁数大的人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他们一是有经验的积累，而是他对这个社会的适应能力比年轻人更强，因为年轻人毕竟刚刚走入社会，这方面的知识和适应能力与岁数大的人相比还是有不足，年轻人学东西快是他们的优势，但是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来说，岁数大的人还是有他们的相对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考虑老龄化的时候，从劳动力供给来说，还应该积极考虑大龄人士的就业和发展，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

从个人财富积累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我们现在讲年轻人养老人，从观念的角度可能是对的，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老年人的这种积累不光是需要社会为他们提供财富，实际上他自己终生也在积累，很多老人从年轻的时候的积累不光是交养老金，实际上他为社会提供的服务、提供的供给也是一种积累，到了他不能工作或者需要社会对他的服务的时候，社会对他的服务也是一种回报，所以不能把老年人作为社会的一种负担，因为老年人作为一个群体，他年轻的

时候提供社会财富，到老龄之后享受社会财富是正常的。

从国家法律制度层面的角度来说，为什么大家对延迟退休意见比较大，反对的人比较多，刚才发言的时候讲到新浪网的调查反对的人比较多，为什么比较多呢？因为我们在制度上没明确。我们现在的延迟退休只是说按照以前计划经济时代那时候确定了标准，现在我们应该把这个观念转过来，转成领取法定养老金的概念，不能再想以前说的退休了。现在我们说的延迟退休还是计划经济的概念，就是我到 60 或者五十几岁就应该退休了，实际上不是，是我对社会做贡献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要从对社会做的贡献中领取回报，为我的老年生活提供资助，应该把这个观念变过来。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光是我们专家学者来研究这个问题，更多的是要在法律和制度方面要制定相应的规则，我们先得明确我们不是说退休年龄，而是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或者说领取养老金的制度。刚才说的公务员法、社会保险法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年金改革，都是从退休年龄的角度来说，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概念转过来，最后要变成领取养老金的时点，这样大家才能接受。我现在提到延迟退休，人家说，我在私营企业，根本没有退休不退休这一说，只是人家看我到了五十几岁，剩余价值不大了，人家和我解除合同了。不光是民营企业，包括很多国营企业，也没有终身就业的，都是几年一聘，这样一来，根本没有一个企业能够保证你终身在这个企业工作，到 60 岁再退休。因为最早提出这个概念就是 1951 年的劳动保险条例提出的，那时候基本是针对国营的，像邮电、交通、铁路，都是国营的，那时候有到什么时候退休一说。到现在一看，特别是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劳动力供给角度来说，你价值最大的时候我利用你，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看，当他认为你的价值不大的时候，完全可以不用你。所以现在要把观念转过来，从延迟退休这个概念变成领取养老金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必须得形成一套法律制度，我们和杨老师做研究的时候建议先得梳理一下现有各种各样跟延迟退休或者跟退休年龄有关的法律制度，因为它涉及到社会保险法、公务员法等，梳理出来以后，最后形成一个养老金条例，逐步完善以后变成养老金法，这里就要明确出来，比如我们定下来一个时间点，不管是 65 岁、60 岁还是 61、62 岁，我们把这个时间点定下来以后，领取的比例可能会变化，比如相应的要提前，可能金额会减少。我想，这个法律的制定是需要社会充分讨论的，讨论完以后变成法律制度固化以后再去执行，只有这样才会接受延迟退休或者接受正常领取养老金这个概念的社会氛围。

第二，完成这个工作，不光是需要专家学者进行讨论、研究，更多的，我们需要教育机构和宣传机构共同参与。因为这个问题要公民达成共识，就像你说延迟退休，如果达不成全民共识，只是政府强推的话，效果一定不好，就像杨老师讲的，我们的人知识就要进小学和初中课本，养老金知识要进入大学教材，让全民了解我们的老龄化现状，让全民知道养老金方面我们

为什么要调整领取结构，让全民形成共识再推动这个事就比较容易。

这次两会期间人社部部长就提出过延迟退休，他当时 2015 年开始研究，明年给中央提出方案，进行社会讨论，2017 年把方案推出，2020 年才开始实施，他提出这个想法就是更多地形成社会共识。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能按照这个进度来推行法定养老金的时点呢？需要讨论，因为那时候有点晚，我们还需要早点行动。所以我们做的研究有一个想法，作为最终实施的时点，可以从那儿开始，但是是不是可以在部分地区作为试点，刚才大家也提出了，有些东西可以做弹性规定，比如大学教授、老专家、老医生，你让他 60 岁退休，对社会来说是一种知识的损失。

唐钧：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别占编制。全世界的国家，教授还是有一定限制的，要是教授不退的话，你们着急不着急？跟财政拨款没关系，就是一个学院、一个系里，教授肯定是要限定一定数额的，只是我们现在叫编制而已。你可以干，但是你不占这个了，肯定没问题，如果你占住这个了，下面的人肯定着急死了，你不退的话我上不来。

姜春力：延迟退休或者推迟领取养老金还需要社会各方面来努力，一方面是领取时点推迟，使大家更多地为自己积累财富，另一方面大家为我们国家的老龄化进程共同地提出解决办法。

罗桂连：我是杨老师的学生，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养老金的，老师请我来可能就是怕我荒废了研究，让我听一听。刚才听了姜主任的总结以后，我的很多观点和姜主任是高度一致了，比如由更多地关注退休年龄转向关注领取养老金的年限，这个大家应该能够达成共识。

第二，对养老金的社会政策要在更大程度上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实际上国外已经有很多很成熟的经验。我当时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关注了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全过程，这些国家在公共治理方面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最新一轮的 2012 年养老金法的改革，实际上 2002 年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工会的主席、还有一个美林证券欧洲委员会的主席，他们三个牵头，做了一系列报告，这几个报告出来以后出了一个总结报告，2006 年，出了推进养老金改革总体方案，每一个过程都是广泛地挂在网上，进行滚翻的社会讨论，大家都可以提出意见。2006 年 5 月份，英国政府养老金委员会开始推出政府白皮书，当年 12 月份出了《个人账户——一种新的储蓄方式》等一系列研究报告，提出改变政府的养老金计划，建立新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划。在这个过程中都是通过了广泛的讨论，所以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养老金改革与欧洲大陆国家有很大区别，并没有出现上街游行等局面。

我总感觉，我们也参与很多政策的制定，很多政策的保密性并不一定要那么强，它的节奏也并不一定要那么快，我们现在开一个会，一个小时就要你提意见，一个小时怎么提意见？然后又说你提，然后就拍板过了，就是说，我们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方式上确实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第二，社会保险这个基本概念可能与社会福利、社会救济还是有区别的，它是建立在政府作为发起人的保险机制的基础上，所以精算平衡还是社会保险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想参加社会保险的群体，比如中产阶级群体，如果他都不能做到自己的缴费和领取平衡的话，怎么能维持这个社会保险呢？那就需要政府大量的资金支持，而这种资金是支持不下去的。英国率先建立了社会福利国家，运转了一段时间，90年代进行改革，2014年养老金法出台以后，养老金运转已经平衡了，但是有一个条件，缴费35年以后，2015年-2016年的领取，一周是151.25英镑，一个月是600英镑左右，相对英国的收入也就是25%-30%左右，这是国际公认的最早进入福利国家的英国现在的福利养老金的水平。就是说，我们做很多事情还是要实事求是的，这个前提是建立在公共养老金的定位，它还是保障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的，这个基本生活需要定在哪儿？我们实事求是地认为，人跟人还是有差别的，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保障在较高水平，那是理想中的社会，欧洲那种机制现在已经在修正了，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国内能不能靠社会保险制度让所有人都过上高水平的生活？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可能不太现实。我们的国有资产公共资源到底能为我们的养老金提供多少，也还值得研究。

第三，我们的社会政策还是要做到以人为本，不要给参与人太多的冲击。我最近查了一份材料，英国调整退休年龄是怎么实施的？英国在95年的时候，当时通过了95年的养老金法开始提退休年龄，95年之前女性是60岁退休，男性是65岁。95年养老金法把女性的退休年龄提高到63岁。它的工作做得非常细，1950年4月6号-1950年5月5号出生的，退休领养老金的时间是2010年5月6号，都是一个月一个月地算的。2010年养老金法要求男女同时提高到66岁，分两步，一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女性的退休年龄从63岁提高到65岁，也是按照一个月一个月地往上走。从65岁提高到66岁，也是很细的表格，你是什么出生的，对应哪月哪日，做到这种程度。2014年养老金法又提出不管男性和女性都提高到67岁，也分了很多档。现在可以看到，1977.4.5号出生的孩子以后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是67岁。一步一步的调整机制，让参与养老金的参保人有一个很充足的预期，你就知道你是什么时候领，你要交多久。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不是延迟退休，而是你领取法定养老金的时间。

另外我对就业空间谈点自己的想法。我们的很多研究都是集中在原来的计划经济思维下，实际上我们的服务力供给不足非常严重，产生的空间非常大，比如医疗、教育，这是高端的。

现在上班的人都知道，你生一个小孩，要求你的父母帮你接送孩子，否则你根本没法上班，这块的市场化要求非常高。还有养老领域需求非常大，我们社区有几个人开始搞社区养老，去年5月投入运营，现在面临一个问题，他们把原来卫校招的妙龄少女都变成了50岁以上的阿姨，为什么这样呢？姑娘搞不定，老头和老太太让她擦屁股，她就哭了。还有很多老头老太太见到漂亮姑娘就抱上去，她就吓跑了。50岁以上的大妈对付老头子就有本事了。所以有很多就业岗位是允许退下来的蓝领工人去就业的，只不过需要一个机制把这些资源挖出来，所以延迟退休的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做，而是通过什么方式让大家平稳地接受，需要通过讨论达成共识，让我们通过精细化的推进，让大家感到这个制度不是要不要做，而是怎么推进的问题。

杨燕绥：下面进行讨论。

于淼：对于那些大妈们，如果她们都回家带孩子了，就挤占了本来应该由市场提供的这份市场。

罗桂连：你还没吃过这个苦。

唐钧：你知道到市场上找一个小时工要多少钱？

于淼：小时工和父母带孩子都属于单个的，如果是一个人带10个孩子，那成本就降低了。如果一年出生200万个婴儿，每20个婴儿有一个人来带，这就是很大的劳动力市场了。假设是5个婴儿一个人带，这个劳动供给会更大。

罗桂连：就是让大家都有事做、有钱赚，不怕成本高，成本高了以后形成福利薪酬体系，就不成问题了。

唐钧：假设每个人工资都能很高，那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咱们的缴费率高，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的工资太低了。是因为工资太低了，不达到这么高的缴费率根本没法维持这个制度。

杨燕绥：我们的缴费率基本不变，把工资提高，这样费率就下来了。

整个欧盟是不允许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带孩子的，让你必须把孩子送到托儿所。

路锦非：人力资本的早期积累，是应该这样的。老人带孩子是非常弊端的。

胡乃军：西方人整体看，老人也好，父母也好，对子女的关爱不一样，老人带孩子确实会出现很多问题。

唐钧：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是是不得不做的，至少在当前的经济条件下，年轻人的经济条件下必须这么做，年轻人出不起那么多钱去请人带。

杨燕绥：现在一老一小都需要产业化，家庭生产能力都弱，小孩儿也一样，老人也一样。

罗桂连：现在还有非常多的服务业没有开发。

杨燕绥：西方就讨论过，拿 75% 的工资回家带孩子，老人就要 25% 作为自己的工资。不知道为什么，西方就要求两岁以后不许放在家里，必须送到幼儿园去，这是一种教育，也是一种福利。

唐钧：我们算笔账，我们是把这些公共服务都做起来好还是延迟退休好？

刘求实老师：我不是专门搞养老金政策研究的，但是最近参加了很多次杨老师团队的研讨会，很有收获，我特别同意姜春力部长所说的，今天杨老师请唐老师过来，虽然观点上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还是非常赞同姜部长的观点，唐老师今天提的我认为还是非常有价值的，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讲，第一，他认为养老这块将来不一定局限于非要从缴费的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至少可以使研究框架作一个更深的拓展；第二，关于延迟政策具体的实施，他提到对公众影响的政治考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讨论的主要是是否要做延迟、怎么做延迟方案，我记得都阳老师提供了一个数据，目前看，实际退休的平均年龄要小于目前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他根据这个数据作出一个判断，说明人们不愿意延迟。在我看来好象不是这样，比如妥老师的研究，他从网上调研的数据看来似乎 90% 的人都不赞成延迟，我认为也不能这么看，因为这是在目前 60 岁/55 岁退休的前提下大家是这个态度。都阳老师说，为什么要体现退呢，为了

提前退想了各种办法，但还能领到目前政策所规定的养老金。刚才很多老师都提到了如果是弹性的，允许大家自己作决定，而且按照百分比降低你领取的养老金，那人们的决策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就不一定非要反对了。我是这样的判断。

唐钧：我的建议是从此以后不提“延退”，因为这个词已经臭了，你一提人家就有情绪。第二，用一个新的方案，别说拿 75%，因为你现在的养老金计算是这么一个数，每年是在往上调的，你现在不往上调了就可以。比如今年拿 10 块钱，明年拿 11 块钱，你别说到明年退的时候你只能拿 10 块钱，而是说你晚退可以拿 120%。

杨燕绥：只增不减，早退不减，延退的增。

唐钧：因为你现在本来就低。

我不是绝对反对改变，但是要有一个策略，我有时候主要是对某些官员的说法很不满意。其实杨老师的方案我基本上可以认可，就是有一些说法再斟酌一下。

姜春力：实际上杨老师现在的概念已经不是退休的概念，就是按养老金的概念。现在国家的政策，第一，建立全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就是说，所有人都会要缴纳养老保险，要缴钱的。第二，你既然缴了钱，就得享受这方面的福利，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享受到这个福利，这就是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跟退休不退休没关系。如果现在你在哪个机构里工作，过两年你不在这儿了，我有积累了，不在这儿干了，或者我生孩子，在家里歇两年再出来工作，这和什么时候退休没有关系。所以我赞成唐老师的说法，现在不要说延迟退休，这个事大家确实比较反对。我为延迟退休这个事，去年和杨老师做这个课题以后，我回去问我的孩子、我的爱人、我的同学，没有一个人同意，我的孩子 20 多岁，他说凭什么呀？你们凭什么可以 60 岁退休，我凭什么得 65 岁？我的爱人说，我过两年就退休了，我还想出去玩儿呢，凭什么我得延迟？我的同学说，你们政策制定别老从政府的角度，你得想想我们老百姓。现在提延迟退休，估计大部分人都得反对，但是换一个概念，我们领取养老金的时点，估计大家能接受。

唐钧：现在换两个概念，一个是弹性退休，可选择。第二，规定法定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有一个时点，然后你可以选择。

杨燕绥：就变成一个机制，而不是一个算数题，最后只要是他自己选择，他肯定选对自己最有利的点，那就对政府没意见。特别怕刚性，我也怕政府一搞就是刚性。

唐钧：还有就是要把个人账户做起来，个人账户不要用现在这种方式，而是用欧洲、英国的个人发展账户，孩子一生出来就有一个人发展账户，政府就给一笔钱存在里面，然后一辈子你有钱就往里存，就是个人养老账户。

姜春力：那是自己养自己。

唐钧：现在咱们的个人账户你是没有产权的，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广东省那年让戴相龙去投资，拿了很多钱，就说今年营利用了，然后老百姓很高兴，我的个人账户是不是能多几个百分点？最后没有，它营利用了跟你也没关系，这是不好的。真正的个人账户就是要银行里开一个户头，政府免税，但是你这个钱存进去以后，没有特殊情况，60岁以前不能动。就是讲延迟，我们延迟的是公共养老金的时间，而个人账户是可以早开放的。我们现在讲的延迟是裸退，有好多人都指着这个养老金生活的，你这个不给我了，即使风一年我也不得了，但是我还有一个东西，现在讲可选择，前面应该还有个个人账户，比如55岁就可以领了，你需要的话就可以领了，这样整个东西就转过来了。

还有，不要用社会保险的概念去覆盖全民，这是不可能的，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缴费。我倒是主张，缴费的待遇就好，不缴费也可以，现在两亿多农民工缴费的只有6%，你工资低可以不缴费，将来政府给你发一份养老补贴，这个养老补贴逐步提高到平均的水平，这可能覆盖到大多数人。就是这两个，你也可以选择，

刚才罗桂连讲的缴费年限也可以有弹性，10年有10年的说法，20年有20年的说法，不是到时候就没了。

杨燕绥：国家已经进入讨论阶段了，其实汪泽英老师就是负责这件事的，我们确实希望讨论多一点，像唐老师说的，现在的困难人群、是不是要到家里带小孩儿，这些东西在座的都知道，这些东西需要说出来。我们研究的，企业费率太高，外资都跑了，对就业的影响，养老金这边是要求降费率，那边赤字已经明显出现了，这些办？今年涨10%，到现在表态了执行了的省还不到5个。其实我们在调研中看到各个地方，省里想压到市里，市里想压到县里，现在急得总理到处找钱，你说市怎么去找钱？一旦不卖地了，现在还有很多问题，到4月份了，涨10%

落实的省不到 5 个。现在压力非常大，怎么解决？可是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不断往上涨，这是制度成本，怎么解决？德国已经是超级老龄社会，不到两个人供养一个人，到 19% 再没涨，可是我们已经 28% 了，还要往下降。这边降费率，那边收支不平衡，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国家以后又要中高速发展，GDP 下降，财政也不能卖地了。

唐钧：实际上可以降的最大空间是住房公积金，根本就可以不要，养老金的积蓄就可以当住房公积金，养老金的积累就可以当现在的住房公积金的用处，新加坡本来也是这么回事。

杨燕绥：唐老师研究社会学，他会从社会的角度、每个人的角度去谈这个问题，我们是公共管理，常常会说当前的制度怎么安排，大家的角度不一样，但是今天有几个共识大家是有的。一个是共识是让退休制度更有弹性，给大家一点选择，这样成本能够降低，我觉得这一点上大家是有共识的。公共政策，尤其社会政策涉及每个人的利益，如果政府一个声音，明显它把困难人群也得罪了，因为你鞭子抽着他，他也延不了。你又把优势人群得罪了，他想干你不让他干。所以这是一个公共选择，我们公共管理研究的就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并不是由政府一方选择，一个部门选择，一个小时做出选择，这是绝对错误的，应该给大家做出讨论，然后在选择中有一个最优，没有最优也有次优，公共管理永远是没有最后答案，但是一定有最优的选择，这是它的一个原则，和我们过去的政府行为有个差异。中国已经晚了，现在再来刚性，大家再一反对，更不敢干了，越是这样的越应该给大家一个选择。

第二，大家有一点共识就是大家都觉得其实到这个时候政府要关心的一定要用法律手段解决的还是领养老金的时间，你把领养老金的时间确定好，再加上有点弹性，早减晚增，让个人根据家庭、根据身体情况决定他是早领，拿着一部分养老金回家看孩子，儿子起码得给碗饭吃，等等。从建国初说的就是领养老金的时间，但是一直用的是“退休”这个字，这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反映。我们现在应该把这个澄清了。现在有人说领养老金和退休时间怎么能分开呢，分开是没道理的，是不能分开，所以政府给他一个选择，早退早领，晚退晚领，有人就可以不去领，我熬着，因为先领只领 80%。为什么西方咨询养老金的人非常多呢，他要给大家算，你要选择你的养老方案。如果一个人提前 4 年领了 75%，他就多了四个 75%，可是 65 岁以后活到 85，就少了 20 的 25%，这样给了一个选择，他就会选择。有人就会选择等到哪一天拿百分之百，有人有急用就可以选择先拿。其实现在关于弹性问题是一个机制，不要那么刚性，给大家一点选择，政策执行成本最低；第二，领养老金的年龄和退休的时点还是要分开，这两个不是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两点上大家有了共识。

大家很辛苦，我们讨论了一个利民利国的问题，达成了两个小小的关键点的共识，我们还会有这样的讨论，下次还欢迎大家。

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